

追“煤老虎”倒查 20 年 扫黑除恶迈向常态化

本报记者刘婧宇

据统计，2020年12月，在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、国企和金融干部中，9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，2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。此外，本月还查处了46名省管干部。

纵观整个2020年，共有18个中管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，其中有11人是省市区市副职。还有14个被查的中管干部，先后受到党纪政务处分，其中6人受贿超亿元。

元旦春节是纠治“四风”的关键节点，每逢节假日通报曝光典型案例，督促党员干部绷紧廉洁弦，已经成为常态。据统计，2020年12月下旬开始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及各省区市和副省级城市纪委监委，共通报曝光192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，其中173起涉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，占通报问题总数九成。

小节不守，大节必失。统计发现，上述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中，违规收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、违规吃喝、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三类问题占比较大，紧随其后的依次是公款旅游、违规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旅游活动安排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等问题。

这些反复多发的“节日病”，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绷紧廉洁弦，切实做到知敬畏、存戒惧、守底线。中央纪委也在元旦前夕发布《关于做好2021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》，引导党员干部自觉抵制“四风”，带头转作风、树新风。

“煤”成能源反腐关键词

2020年能源领域重拳反腐，“煤”成了关键词。2020年12月4日，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一次性发布了5名厅官落马的消息，其中包括自治区原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、厅长白盾，内蒙古矿业(集团)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苏日勒格。截至目前，内蒙古自治区已有超过500名官员倒在煤炭领域。

2020年，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屡次以“N连发”的形式，通报官员被查消息，其重要背景是2020年3月份以来，内蒙古自治区组织12个巡视组，对煤炭领域重点巡查，“紧盯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”，倒查20年，明确提出“要对2000年以来全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情况进行全方位透视会诊”。此后，包括涉煤国企以及党政部门均有官员被查出涉煤贪腐。

为进一步遏制能源领域腐败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规范领导干部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参与矿产资源开发行为的规定(试行)》，明确领导干部的配偶、子女及其配偶，不得在该领导干部管辖的区域或者业务范围内参



与矿产资源开发，不得利用该领导干部的职权或者职务影响参与矿产资源开发。甚至在领导干部辞去公职或退休3年内，这类行为都是被明令禁止的。

涉矿腐败并非一地特有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全国31个省(市、自治区)中，有13个地方被中央巡视组指出存在涉矿腐败问题，占比高达41.9%。而此次内蒙古向“煤老虎”开刀，短短数月已立案查处相关案件410件、534人。目前，落马的官员涉及政府、人大、司法、审计、自然资源、国企等多个系统，其中不乏辞去公职、退休多年的人员。

小小煤块牵扯众多利益环节，在行情“高歌猛进”的年代，其逐渐沦为腐败的温床。有煤老板被查后，用“每个环节都需要钱铺路”来描述这一行业的复杂政商关系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煤炭开发行政权力介入深，权力寻租空间较大。开一个煤矿需要有采矿、生产、安全、经营等方面诸多证件，涉及多个部门，任何一处关卡出现松动，就会出现問題。

为了得到庇护，一些不法商人或大肆行贿，或力促官员参股，一旦成功便有了保护伞。遇到监管部门找“麻烦”，保护伞就会“打招呼”“批条子”。官商勾结、抱团牟利，形成了一条黑色的利益链。

另一方面，部分涉煤地区对党风廉政建设

重视程度不够，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有时碍于面子，对腐败问题遮遮掩掩；纪委问责不严，追责不力。在这般宽松的环境下，手握重权者有恃无恐，一步步陷入“以煤谋私”“靠煤吃煤”的深渊。虽然事发后一些落马官员面对镜头声泪俱下，但也已于事无补。

“倒查”式追责，一方面揪出腐败分子，让相关管理者切实树立起对于制度的敬畏之心，另一方面也让公务行为终身负责制落到了实处。

违规吃喝仍高发

2020年12月4日，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8周年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截至2020年10月底，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问题37.5万起，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51.8万人。

2020年12月24日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0年11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数据，这也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第87个月公布月报数据。

2020年1至11月，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1.7万余起，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7万余人，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0万余人。

连续87个月坚持公布的月报数据，见证了八项规定精神落落实地、深入人心。

数据显示，在被查处的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问题中，违规吃喝占据主要位置。仅2020年11月，全国共查处违规吃喝问题1136起，占查处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18.9%。2020年12月初，由云南省纪委监委宣传部拍摄的反腐警示专题片《围猎：行贿者说》，就揭开了吃吃喝喝温情面纱下，领导干部逐步被围猎的惨痛教训。

重庆商人程绪库直言：“从我们的角度，我们就是猎人，这些领导就是猎物”，他“围猎”云南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(时任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)周凯的过程，就是从饭局开始。

经朋友介绍，程绪库在饭局上结识了周凯；此后，程绪库就经常去机场接周凯回家，一步一步靠近他同他攀关系。此后，两人就像“谈恋爱”一般开始相互试探：程绪库先送一块手表，周凯让司机分两次把钱返还。虽然送礼未成，程绪库却认为：“只要他不排斥和你交往，就已经是机会了”。

再往后，周凯每次回成都，程绪库都会约他一起吃饭。两人交往多了，彼此间的信任就建立起来。“认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人比较放心，也没想过他会害我。”周凯说。

然而，程绪库却坦言了真实目的：“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揣测他、观察他、了解他，花很多精力去逢迎他、讨好他，花很多的钱，哪怕东拼西凑也都要满足他的要求，这就是一个‘投资’，这个‘投资’是属于一本万利的事情。”他甚至赤裸裸地说：“在我们眼中，他就是我们获取利益的一个工具。我们的目的，就是要从他身上获取更大的利益。没有谁从一开始会说，是抱着交朋友的目的去的，所以我们交往也是很危险的。”

相识3年，程绪库的“围猎”渗透到周凯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周凯最后数钱，都已经数到害怕了，他“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在数钱，而是自己在给自己‘坟头’撒纸了”。从点点滴滴入手，程绪库顺利打通了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变现暗道，而周凯也断送了自己的前程，以涉嫌受贿罪、为亲友非法牟利罪被提起公诉。

有的人在形式上遵守了八项规定，但特权思维却一直根深蒂固。

2020年12月25日，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，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、副院长邵有田严重违纪违法被“双开”，在其“双开”通报中，颇为罕见地出现了“违反法律法规，机动车长期不悬挂号牌上路行驶”的表述。

据办案人员介绍，他最初托关系办理过特殊车牌，也使用过单位公车，2016年公车改革后，邵有田购买了私家车。没有了特殊车牌，邵有田干脆不再悬挂车牌。在上路行驶途中遇到交警检查时，邵有田有时一本正经借口“参加紧急会议”蒙混过关，有时则摆出官

架子声称“办理重大案件”，遇到执勤辅警时，他甚至肆无忌惮利用职务威胁恐吓。日久天长，“邵有田”的大名俨然成了“通行证”。

扫黑除恶迈向常态化

2020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战决胜之年，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据，2020年1至11月，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“保护伞”问题2.96万起，给予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党纪政务处分2.54万人，2383人移送司法机关。

随着三年专项斗争收官，不少人担心，黑恶势力会不会死灰复燃？

2020年12月印发的《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(2020—2025年)》给出了答案，强调推动扫黑除恶常态化，建立长效机制，要依法依规、宽严有据、罚当其罪，既不能“降格”，也不能“拔高”，确保针对黑恶势力的斗争不走偏、不变形。

黑恶势力作为社会毒瘤，企图把持基层组织，拉拢腐蚀党员干部，寻求政治靠山和“保护伞”，在地方扎根颇深，打击铲除难度往往非常之大。

梳理2020年12月公开的一批黑恶势力案例，四川“杨狗”案突出体现了上述特点。

“杨狗”是杨树林在四川遂宁射洪市广为人知的绰号，靠放高利贷赚取第一桶金后，逐渐发展形成以杨树林为组织者、领导者的人数众多、骨干成员相对固定、层级结构明确、较为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。

他曾带人围堵政府单位，并指着该单位负责人鼻子骂“老子坐班房都要收拾你”；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后，他又要求身边小弟要把扫黑除恶精神“读懂、嚼烂、吃透”……为打击杨树林黑恶势力，办案人员搜集了1600多GB的电子证据、翻看了700余本案卷。

2020年12月16日，据云南省纪委监委消息：云南省公安厅原保留副厅级待遇干部汤跃宏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违法，目前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。汤跃宏一直在云南公安系统工作，从警年限达37年，被查处时距离其退休已有6个月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2020年12月22日，反有组织犯罪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。草案要点之一，便是将恶势力组织上升为法律概念。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将恶势力组织上升为法律概念，有利于将恶势力组织消灭在初期萌芽状态，也有助于除恶务尽、打彻底。

专家分析，该草案除了进一步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、规范化水平，同样释放了“扫黑除恶”常态化的明确信号：专项斗争收官不等于扫黑除恶收手，决不让黑恶势力及其“保护伞”死而复生、由小转大。

(资料来源：新华社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、中国纪检监察报等)

每月“纪”录

被抢手机!被踢皮球!记者亲历农民工“讨薪难”

本报记者冯大鹏

岁末年初，农民工工资欠工作备受关注。来自河南、湖北的200余位农民工2016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一建筑工地务工，至今工资未结清。日前，部分农民工前去讨薪，却遭遇踢皮球。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，该建筑工程无证建设长达5年，有关部门监管不严欠薪埋下祸根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根治农民工欠薪强制手段落实到位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政策“最后一公里”尚需落实到位。

5年走过漫长讨薪路 工地钢管已锈迹斑斑

张家兵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余集镇文冲村人，从事建筑工程劳务工作。2016年年初，他带领农民工进入河南郑州新密市曲梁镇大稳溱水城一期13号楼进行土建施工。经过半年多辛勤劳动，工程主体封顶。

然而，把工程发包给张家兵的项目负责人李建却一直未向农民工支付工资。无奈之下，张家兵只好变卖房产，为生活困难的农民工支付少量工资，并和农民工一起走上了讨薪之路。

2018年春节前，仍未拿到工资的张家兵等人赴河南省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反映情况。2018年9月，新密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相关情况立案调查。2018年12月，新密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形成《案件调查终结报告》。报告显示：李建分三次向张家兵所带领的工人支付工资60.5万元，加上张家兵之前垫付的264万元，166名农民工工资已全部结清。

“当时为了拿到一部分钱，我被迫承认结清了农民工工资。其实，李建许诺的60.5万只到账了40.5万，我垫付的钱也远不到264万，农民

工工资还有很多没结清。”每当春节临近，那些跟着张家兵干活的“老伙计”都要登门要账，张家兵只能一遍遍做解释，却拿不出钱来。

2019年，在有关部门的建议下，张家兵将项目开发商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诉至法院。“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说我手续齐全，到法院应该很快就能解决，没想到这法律程序一走就是两年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果。”张家兵说他已经走投无路，不知道这个年能否挨过去。

据了解，2020年1月，新密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判处被告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张家兵工程款5.4万元。“当时工程款还有数百万没付给我，法院的一审判决明显不符合实际，有点荒唐。”

张家兵随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2020年5月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，认为“本案遗漏了必要的诉讼参加人李建，原审认定事实不清，应当发回重审”，将案件发回新密市人民法院重审。

然而，把工程发包给张家兵的项目负责人李建却一直未向农民工支付工资。无奈之下，张家兵只好变卖房产，为生活困难的农民工支付少量工资，并和农民工一起走上了讨薪之路。

2020年10月，新密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，判处李建支付张家兵工程款496万元，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认为，已经向李建结清了绝大部分工程款，随即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。2020年12月23日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案件，案件截至目前尚未宣判。

2020年12月24日，张家兵和农民工们从湖北省襄阳市和河南省南阳市、信阳市等地来到新密，再次讨薪。此时，项目名称已从大稳溱水城变更为“东方经典·溱水印象”。

一位农民工望着他当年挥洒汗水的工地，指着墙上张贴的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，无奈地感叹：“这里的钢管都已经锈迹斑斑，可工人的工资仍旧没结清。”

记者采访手机被抢 农民工“又白跑一天”

农民工们来到项目开发商的办公楼打听情况，刚一进门，便被两个工作人员给轰了出去。记者正在用手机记录讨薪过程时，一个工作人员一把抢过手机，并勒令记者将视频删除。

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经理徐宏伟称，开发商已经给李建支付了13号楼工程款，是李建没有给农民工支付工资，建议张家兵和农民工去找李建，并等待法院判决结果。然而，张家兵一直联系不上李建。记者多次拨打电话，也未联系到李建。

曲梁镇劳动保障所所长马保伦闻讯赶来，向徐宏伟宣讲了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中的规定：“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，并将人工费用及时足额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，加强对施工总承包单位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监督。”徐宏伟并未接马保伦的话茬，让等待法院判决。

记者和农民工一起来到曲梁镇政府，被告知领导均不在，一位副镇长在电话中称让农民工们去找劳动保障监察部门。

在新密市劳动保障监察大队，一位值班的工作人员称领导们都下去办理欠薪案件了。记者看到，劳动保障监察大队的几个办公室都悬挂着“新密市根治欠薪联席会议”的牌子，一个办公室里整齐地摆放着住建局、水利局、信访局等部门的桌签，但没有工作人员。

记者向新密市政府有关负责人反映欠薪情况，也未获回复。

马保伦说，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仅仅是协

调部门，负责沟通各个局委，缺乏强制手段。

但是，2020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》明确规定：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时，发生用人单位拒不配合调查、清偿责任主体及相关当事人无法联系等情形的，可以请求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协助处理。”

张家兵认为，法律规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可以去查询相关单位的金融账户及房产、车辆状况，明明有监管手段却不去使用，这是在推卸责任。

夜幕降临，张家兵站在新密市政府门前，手持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年11月5日印发的《关于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，垂头丧气。“又白跑了一天。春节越来越近，不知道这个年，还能不能过得去。”

项目长期无证状态 治欠薪关键在落实

近年来，记者持续对农民工讨薪进行跟踪报道，发现很多欠薪都是建筑工程证照不全或用人单位没有资质。如果建设单位及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对农民工工资按时支付监督不力，便给欠薪埋下了祸根。

经调查，大稳溱水城项目2015年9月开工。在开工建设的时候，该项目并未取得相关证件。5年间，该项目长期处于无证建设状态。

记者前往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新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核实，工作人员称该项目直到2020年7月10日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2020年10月12日才取得不动产权证，2020年11月6日才取得建筑工程施

工许可证。此时，该项目主体早已封顶，并已对外销售。

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侯泉兴告诉记者，该项目开建时属于安置房，目前已经申报为棚改项目。“按照规定，这类项目可以享受边建设边办证的优惠政策。”

此外，据调查，李建并没有建筑工程企业资质，他借用了河南省宛南建筑有限公司的资质，从开发商河南大稳置业有限公司手中拿到工程，然后才转包给了张家兵，而张家兵当时也没有建筑劳务资质。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规定，建设单位将建设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，有关部门可以责令改正并处罚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巩魁生表示，建筑市场长期存在“违规发包转包等查处工作难度大却惩处力度较低”的问题，建议加快修法进度，加大惩处力度，对建筑市场的违法、违规行为形成震慑。

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二级巡视员李鹏举介绍，农民工欠薪案件集中于建筑工程领域，应落实已有规章制度，加强事前监管。

贵州大学新闻社会学教授翁泽仁也表示，目前治理“讨薪难”并不缺乏制度和文件，关键在抓落实。

马保伦等基层劳动保障监察部门工作人员建议，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各个部门应从源头上加强对建筑工程的监管，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农民工欠薪。

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为，只有真正做到市场主体自律、政府依法监管、社会协同监督、司法联合惩处，才能切实保障农民工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。